

前 言

不安全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主张对经济实行民主控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斗争。前者代表的是金融利益，后者则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从经济方面讲，社会民主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是“安全”，而东山再起的自由市场恰恰毫不掩饰地排除了这一基本经济特征。假如社会民主不能带来安全，那么它就一文不值；自由市场要是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的话，那就不是自由市场了。不过，自由市场倒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为金融利益提供了安全。每逢自由市场制度经历周期性危机时，一切调整和风险的负担总是被转嫁到大多数人身上。

那些以出卖劳动力求生存的人感到不安全，并不限于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的恐惧还延伸到担心丧失居所和抵押贷款，担心被盗和遭到入室抢劫，担心他们的孩子受到一氧化碳和汉堡包的毒害。而且，如果大量的文章中教给你如何处理各种关系你都照办，人类能不能繁衍下去也就成了令人担心的问题了。我们这个国家对自己也不放心了，这个国家已疾患缠身，需要好好治疗一下了。

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一个处于严密监视下的民族。自由放任主义对公平的信条只适用于金融利益和大企业。不安全

时代产生自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新型的指令经济，在这种控制之下，资本是自由的，而劳动人民反倒国有化了。现在，公民不仅对毒品和战争心怀恐惧，还怕儿童福利巡视员来拜访。

我们这本书贯彻始终的一个主题是，我们需要社会的经济公正，这种公正能够兑现。目前阻挠我们获得公正的人既有伪装的朋友，也有不共戴天的敌人。

拉里·埃里奥特

丹·阿特金森

1998 年 1 月伦敦

导 言

战争结束了 祝圣诞快乐

谁掌握过去 就掌握了未来 谁掌握现在 就掌握了过去。¹ 乔治·奥威尔这句名言至今仍被人们铭记在心。自奥威尔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谁来写历史而进行着一场战斗。不过目前对历史的阐述仅仅集中在描述不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景，我们将这一时区称之为“现在”。迄今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进展是微乎其微的。这场斗争伴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工具和最新的摄影技术的出现而起，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都是一些高度专业化的舆论制造者和宣传家 还加上他们麾下的‘反击’和‘进攻’部队 其服务对象却是公司的和政治的巨大利益。法国哲人雷吉斯·德布雷曾把一个国家的生命比作国家领导人创作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些小人物，其微不足道的程度连他们自己都难以想象。”² 或者 正如英国军队在困难时期所说的：“究竟是谁在写这部戏的脚本呢？”

1997年的英国就像一部戏剧，它表现了一个重大的大融合主题，把“历史的终结”写得完美无缺。在英国，在不同程度上还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左右两派进行了长达 200 年之久的斗争已经停止了。年轻的英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主持了这个胜利的停战日，就在这一天，左右两派应邀以久享盛誉的圆桌会议形式坐在一

起，来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作出他们的贡献。右派贡献的是经济学，左派贡献出来的则是同情心，其核心就是宽容。这个亚瑟王式^①的政治制度以外的人都是一些原始人，野蛮人，或者是一些愤世嫉俗的人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与这个政治制度“毫不相干”。当年轻的国王在暖洋洋的宫廷宴会大厅里与他的臣子大摆宴席之时，谁要是落得个在阴冷的山脚下瑟瑟发抖总是不好受的。此时，自己能和新秩序达成和解，重返舞台同其他演员同台演出，接受这个已写好的剧本而不是与它对着干，这些对他都有很大的诱惑力。

尽管如此 就像迂腐的老校长们常说的那样“学校里难免有捣蛋的学生”也总会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认为 这些捣蛋的角色能够发挥可贵的作用。我们对 1997 年发生的大事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 1997 年并非标志着什么大融合，也不可能把政治传统中濒临枯竭的精华抢救出来，这些事件只是激化了一场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确立为世界唯一的社会 - 经济制度的战争。一个悲天悯人而极富活力的新不列颠(或新法兰西 或新欧罗巴)只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或见于颂扬 豪情满怀的英国或戴安娜王妃“带鲜花的革命的空洞千字文中 除此之外 实际上它并不存在。在为建立国际资本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进行的征战中蒙受伤亡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相互矛盾的说法反映了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一种是虚无缥缈的一厢情愿 另一种却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左派自以为大有收获，其实大都是幻想。首先是年代的幻

^① 亚瑟王式(Arthurian) 源于英国传奇中的亚瑟王(King Arthur) 据说他是圆桌骑士团的首领，后被引申为征服世界的人。这里指西方的一批政治精英人物。——译者

想，其根据是右翼的货币主义开始压倒已显式微的战后一致主张。至今已有 20 年时光，现在已经到了转变方向的时候了。

在这种想象出来的情景下，自战后体制瓦解以来，已经过去了 20 年。在这 20 年中，英国曾于 1976 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行削减开支，同样重要的是 1997 年英格兰银行曾实行高利率来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IMF Letter of Intent，其中规定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利率如此之高以致不得不取消对英镑的管制。美国也同样受到影响（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思维”的前身吉米·卡特的“新自由主义”为货币紧缩政策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影响到法国（吉斯卡尔总统首次遭到第一代长期失业者的困扰而不得脱身）和德国（施密特总理的反通货膨胀立场使来自土耳其的外来劳动大军受到压力）。

简言之，70 年代中期以来，生活变得十分恶劣，而现在已经出现转机。甚至在遥远的爱尔兰，自 60 年代后期燃起的熊熊大火在新出现的充满乐观希望和同情心的情绪中也即将熄灭。这是必然的趋势：时间是不会骗人的。

确实，60 年代以来地球上的庞然大物似乎都是这种情况。克林顿夫妇同布莱尔伉俪在伦敦的新潮餐馆里共进晚餐，布莱尔先生在法国度假时与若斯潘总理共享午宴，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了切克斯官邸，^①托尼·布莱尔拜访叶利钦总统时以个人身份出现在俄罗斯广播电台的系列报道中，香港回归中国使中英两国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显得关系格外良好。

^① 切克斯官邸（Chequers，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宅邸，位于伦敦西北 35 英里处的白金汉郡，现为英国首相的乡间官邸，因此以官邸成为英国首相的代名词。——译者

经过了 20 年的对抗、不平等、战争、意识形态冲突和互不相容之后，一切迹象表明时钟的钟摆已经开始悠长地向回摆动，爱心（或者实质上大体是这个意思）再次成为你所需要的东西。

对于厌倦战争的人们来说，哪怕仅仅暗示一下两方体面地打了个平手，或者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在眼前也是求之不得的。一个时期以来，当战争一直朝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时，对于那些疲惫不堪的老兵来说，这种迹象具有双倍重大的意义。

在这种影响得到强化的状态下，出现了一批极力捍卫这种最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人，这在西方世界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制度有着不同的名号，如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社会戴高乐主义”、基督教社会传统、美国式自由企业制度。在这个名称中，重点是“美国”和“制度”这两个词，以及战后格局等等。自从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以来长长的八年中，在他们意想不到地战胜了苏联的专制主义及其在西方的代理人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他们一直在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且自以为取得了胜利。就像哈罗德·戈德温森一样，在取得斯坦福布里奇的胜利之后，立即挥师向黑斯廷斯进军，与另一支部队交锋，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也把自己投入了另一条新开辟的战线，又同哈罗德国王的命运相似，他们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打得颇不顺利。

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对者阵营内部存在着战略上的分歧。他们拥有的一些最坚固的堡垒已经失去了保卫的价值；他们的战线上

① 哈罗德·戈德温森 Harold Godwinson 英格兰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国王哈罗德二世。这里说的是 1066 年哈罗德二世与诺曼底公爵威廉的一场战争。哈罗德在斯坦福布里奇打了胜仗后，又在黑斯廷斯开辟了第二条战线，结果兵败身亡，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译者

一些守备要塞洞门大开；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声名狼藉，其中包括心怀不满的老工党贵族，一些出身高贵的保守党人，一群过去的欧洲共产党的响应者，教皇，查尔斯王子以及那些梦想一步登天的乳臭未干的游击队领导人，至于法国的右派、美国共和党里令人生厌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更不必提了。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指挥部是不大可能让人们对它充满信心的。以上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一种看法认为，这场斗争表面上不甚乐观，实际上却进展顺利。有些人很愿意接受这种见解。而暗示敌人实际上已在乞求和解的看法则更是大受欢迎。自从特洛伊木马首次出现直到戴高乐总统向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响亮地宣告“我理解你们”，历史上有大量事实表明，饱受战争创伤的人是很容易争取过来的，但是同样也有许多足以警世的故事表明，那些被争取过来的人是多么愚蠢。

1997年，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后者在程度上稍逊于前者，都从战壕里探出头来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交战双方已经取得了大和解。战争结束了，即便说尚未彻底结束，至少也是停火了。这是因为“动力中心”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一代领导人，主要是英国的托尼·布莱尔、法国的利昂内尔·若斯潘，还有待人宽厚积极走中间路线的自由放任主义大叔克林顿总统，他们异口同声地宣布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无限期地停火了。社会民主党人感到意外的是，据说他们一直在进行的这场生死搏斗本来就不是那么了不起，本来就该结束而不致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远离火线的地方，中间派政客与国际资本主义就和解问题做成了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前者确实对后者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资本自由流动，对一切投资彻底取消管制，永远执行合

理的货币金融政策，废除不堪负担的福利制度，以及建立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动力中心”方面当然也有所获，其交换条件就是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更加宽容开放的健康社会。

只需粗略地看一看这些交换条件就会发现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就是所有实质性的让步都由一方单方面向对方作出，而自己这一方得到的仅仅是各种良好愿望的空话。这也算不得是什么学术观点 劳动人民——这里指的是那些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人——在这一和解中不仅受到了一次损失，而且可能是双倍的损失。对于他们来说，压倒一切的需要就是人身、金钱和物质的安全。准确地说，这一切在已签订的和解协议中都被一笔勾销了，而他们由于文化和阶级背景则很可能使自己在所谓争取健康社会的努力中成为靶子而不是受益者。

说实话，大概没有人会把一部《新闻自由法》或一部成文宪法当成失去就业安全的人得到的公平补偿。讨伐饮酒、吸烟和大吃大喝的运动可能只是更增加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减轻他们的负担。至于对那些时髦疾病的可怜的受害者深表同情，这种廉价的同情还是留给那些名流和“准”名流吧。

1989年 奥斯汀·米切尔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白领和工党议员那样的中产阶级”。³可悲的是 到了现今布莱尔时代，这倒真的成为唯一的目标了。这一笔忍痛牺牲的和解交易只对一方有利，具有一边倒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报道一下战壕里传出来的怀疑论，他们拒绝放弃阵地，也不放下武器，他们要坚守防线，倒是可以算得一吐为快。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就和他们的前辈特洛伊人一样，在沉醉昏睡过去之前还在开怀畅饮。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迷迷糊糊地发觉正有一

些黑影从木马的腹部爬将出来。

那么这场徒有虚名的和平目前的进展状况又如何呢？来自不同战场的几篇战况报告可能对和平的条件作一点评估。

战地报告之一：来自国内战线

1997年9月伦敦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上出现了1945年胜利日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当送葬行列往北行进，走向戴安娜在米兰德的一生最终归宿地时，英国的一切都停顿了。一个星期前，法国内务部长宣布威尔士公主在巴黎市中心因车祸身亡，震惊了全世界。一周后，全世界媒体面前演出这部不寻常的戏剧最后高潮的一幕。正常的生活完全被颠倒了过来：出殡的那一天，没有几家商店开门营业，电视和广播几乎全都在报道这出悲剧（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凡是临近送葬队伍途经的地方，交通都作了必要的调整，以便送葬队伍通行。仅仅在芬奇莱路就有100万人站立在道路两旁。这些人彻夜排队在圣·詹姆斯宫里的吊唁簿上签名。戴安娜的住所肯辛顿宫门外堆满了花圈。这些花圈据说都是终于不再控制自己情感的国民摆放在那里的。

这时，一些医学专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出面通过印刷和电波教导英国人什么样的哀悼方式才是适宜的，有些地方却可以听到窃窃私语，将这些专家称为“管制悲伤的警察”。王室通过书面表达情感的方式声称他们已经哀悼过了，人们认为这还不够，认为王室必须当众表示哀悼，于是王室也不得不顺从这种要求，女王适时地在电视上露面，确认她对戴安娜之死是悲痛的，查尔斯王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应要求出现在巴尔莫勒尔城堡（Balmoral）外检视

花圈。情绪化的文字看来成了用来描述“感情法西斯主义”的工具。

但是，政治权势当局对于“无约束的英国”是否可取则有少许疑问。《星期天电讯报》9月7日引用了一位政府大臣的话说：“英国人曾经度过了两个难熬的十年。托尼和戴安娜都让英国人动了感情。”托尼在布赖顿举行的工党年会上成了中心人物。19年来，工党首相在年会上发表讲话还是第一次。这次聚会的安全措施却一点也没有显示英国正在解除束缚。沿海大片地区和向内延伸数百码的街道都被封锁起来，警备森严以确保包括会议中心、大都会饭店和欧迪电影院在内的地带彻底安全。警方的飞艇在空中盘旋，维持治安。这种架势超过了撒切尔夫人对任何一次活动要求的规模。正是在这个坚不可摧的要塞城堡里，首相宣告“付出的时代”^②开始了。

所谓的“付出的时代”严格说来最终将是一种宗教式的心路历程。新工党最初采取的行动包括取消学生的奖学金，开始实行学费制；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提出的将病人诊费提高到10英镑的建议没有遭到否决；布莱尔首次任命的大臣之一弗兰克·费尔德在社会保障部里不遗余力地推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福利制度改革举措（“匪夷所思”这里可理解为凭空臆想出来的肢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正是右翼思想库苦苦追求的目标）。到了那年的

布赖顿（Brighton），位于伦敦以南、英吉利海峡的北岸，为英国旅游度假胜地。——译者

“付出的时代”（the Giving Age）即国家要求国民为某种伟大的目标作出牺牲后面出现的“获取的时代”（the Taking Age）与之相对。这里是指要求国民牺牲自身的利益，而大企业则从国家对其作出巨大让步中获得好处。——译者

12月初，政府第一次遭到后座议员的反抗。这次叛乱是由削减单身父母补贴计划而引发的。紧接着就该轮到残疾人了。

11月，工党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绿色预算（讨论稿）”简要说明这种所谓的“新思维”，其中只字未提对资本的控制。对资本的控制早已被工党所抛弃，被认为既不可能做到，也不可取。如果说控制数以十亿计的英镑在英国流进流出无法做到，却也没有提出控制烈性酒和烟草的禁令。布朗先生全盘接过了这类商品的喧嚣黑市。烈性酒和烟草之所以形成嚣张的黑市是因为英国对这些商品实行高关税，而欧洲大陆则普遍实行低税率；黑市是税率差异的产物。根据单一市场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数量的此类物品带入英国，只要他们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供个人消费使用的。工党对于这种肆无忌惮的贩私行为作出的反应是授予海关新的强制性权力。由此看来，所谓的“付出的时代”似乎不大可能与公民自由权利观点有什么密切联系。工党将警察法案确立为法律。这个法案是保守党政府下野之前遗留下来的。根据这一法案，执法部门可以不经法院批准闯入私人住所，窃听电话，同时在诉讼制度上向美国式“不胜诉、不交费”制度靠拢，而这些早在中世纪时英国已宣布为非法行为了。在工党大会几天之后，竞选失利的保守党在尤斯顿登上了破旧的“圣玛利亚”号火车前往布莱克普尔进行反思。这些卸任的大臣们第一次有机会对他们实行铁路运输私有化的情况进行亲临现场的视察：火车肮脏不堪，没完没了而又无理可说的误点，其状况之恶劣绝不亚于英国铁路时代最黑暗的日子。

① 后座议员 (backbencher)，指通常坐在议会后排座席 (backbench) 的议员。这些议员一般是年纪轻、资历浅，在政府中地位都较低。英国议会讲求资历 (seniority) 资历深、地位高的议员在议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

工党不仅接受了私有化，而且信誓旦旦要把私有化进程继续下去。在 1997 年的竞选中，工党抛出了一个主意，要卖掉空中交通管理权，借此来筹集 5 亿英镑的资金；10 月，工党又宣布了它做成的第一笔出售交易，卖掉了联邦发展公司（Commonwealt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这家公司是 1948 年艾德礼政府创办的，旨在优先援助英联邦内部较为贫困的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曾经是世界上实行私有化的试点国家；而现在布莱尔却同意公有部门的规模继续缩小，与撒切尔时期的作为有许多共同之处。几乎无人能否认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中有许多是成功的，这些企业主要处于政府一开始就不该介入经营的领域，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些豪华宾馆、免税商店、火车站的饮食柜台。毫无疑问，第二类公司归入私营部门也确实较为明智，只要商业和技术上做得到，比如英国电讯公司、英国造船厂、英国石油公司等。但是在撒切尔 - 布莱尔的方针中缺少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私营部门仅仅是经济中的一个部门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公用事业机构如水电供应和铁路是不宜私有化的，私有化带来的后果在公众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以往的公务员转变为“企业家”，手中还掌握着发行的股票，他们私欲膨胀，贪婪地攫取股票、奖金、大手大脚地发放年金做交易以及实行其他种种物质刺激，从而在全国引起一片愤怒。凡是最初实行私有化越不恰当，对公众的服务越差的部门（其中最主要是供水系统）董事会里的不轨行为就越发令人震惊。

产业界的老板们迫不及待地纷纷加入这个行列。90 年代中期曾试图通过英国商界大人物组成的各种委员会来抑制这股狂潮，用意虽好，结果却是可悲的失败。1997 年 10 月，商业道德监

察机构 PIRC 揭露，在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和原有的私营企业中，老板们自己为其经济效益设下了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越过这些障碍实在是太容易了，即使这些公司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竞争对手，它们仍然可以拿出钱来实施物质刺激计划。PIRC 宣称 这样的盈利率到了世纪之交，肯定会在一般公众中燃起愤怒的烈火。

总之 产业界的老板们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们 他们悠闲地坐在离前线 40 英里的欧洲庄园里，呷着从酒窖中挑选出来的美酒，一边向泥泞不堪的战壕里的士兵发布命令 要他们跃出战壕时心中要想着国王和祖国，唯一区别是接受命令的不是战壕里的士兵，而是面临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排着长队领取救济金的工人 要记在心头的不是国王和祖国 而是公司必须在全球性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

与其说这个时代是‘付出的时代’倒不如说是‘获取的时代’，至少对于少数上帝的宠儿来说，这是“获取的时代”。到了 1997 年底，“付出的时代”按其自身决定的条件，也变得不太让人喜欢了。一位‘英格兰保姆’（实际上是一位‘互裨’姑娘 路易丝·伍德沃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被指控谋杀了她照顾的孩子，被陪审团判定有罪，引起了公愤。这一事件暴露了“冷静的英国”的阴暗面。美国人倒是同情这位年仅 19 岁的姑娘，认为判处终身监禁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当法官宣布撤销原判决时，这些怀有同情心的美国人仍感到震惊，而法官的改判在这位姑娘家乡的酒店

互裨姑娘（au pair）指一些年轻女子到一户人家做服务工作 这家人则为她提供条件让她上学或学一门技能 作为交换条件 建立一种‘互裨’关系。——译者

里却引发了欢呼胜利的场面，这一场面通过电视传播到美国的每个家庭。享有宽容美誉的‘新英国’在世人面前的表现完全暴露了这个国家在发高烧，而且自欺欺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最要紧的是将‘我们中的一员’从美国最为开明的一个州争取回到自己的家园，与此相比，一个混血孩子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在一些小报的想象中，把美国的这个州一下变成了沙特阿拉伯式的专制统治了。

就在此时，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不声不响地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中度过了这一年，而那个令人讨厌的约翰·梅杰此时则在大斯图克莱村自家花园的观赏池塘边晒太阳，为了维护地方上和全国性报纸记者的利益，三缄其口，一语不发。最酷的‘激动来势之猛使狂热中姿态最高的受害者似乎在兴奋状态中度过了一年，而最大的受益者托尼·布莱尔却在为处理一件‘小小的’丑闻的后事而苦苦挣扎。本来一级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不准烟草公司赞助的，工党政府却解除了这一禁令。这就是那件现已臭名昭著的丑闻。据透露，这次大赛的一家主要赞助商在大选之前曾向工党捐赠了 100 万英镑。布莱尔即以一种典型的方式作出反应，提出了抗议，声称工党是清白的，并谴责这种筹款制度，主张为政治活动“付账单”的应该是纳税人。同时又暗示，在酒店和餐馆里强制设立禁烟区实际上是逼迫成百上千个小酒店、小餐馆关门歇业。

至于那个一级方程式汽车大赛的赞助商，他已经从那个窘态百出的政党那里收回了他的钱。这件事赋予“付出的时代”一个全

新的含义。1998 年来临 保守党内部仍然意见分歧 士气低落 工党为此感到庆幸。内务大臣杰克·斯特劳的 17 岁的儿子威廉·斯特劳因向《每日镜报》的一位记者提供大麻而被捕。斯特劳先生声称，此事不会改变他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立场。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下令禁止出售带骨牛肉，为的是防止感染疯牛病，尽管这种危险极其微小。工党在保健问题上的行事方式就像保姆照看孩子。这就在公众中引发了第一次反对浪潮。政府为庆祝千禧之年制定了一个计划 其中心内容是耗资 7 亿英镑在格林威治建造一座圆顶建筑，这引起了人们持续的敌对情绪，特别是这件事发生在削减福利开支的时候，自然是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战地报道之二：来自欧洲战场

在前所未有的金融大炮火力网的轰击下 欧洲大陆的证券交易所震颤了。在 1997 年初秋几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跨国界的企业合并浪潮使一度沉睡的欧洲交易所震荡不已。这是自由放任主义对曾为“社会传统”堡垒的冲击，也就是冲击了莱茵河以西的企业格局。对此持赞同态度的战地记者幸灾乐祸地发现，甚至法国现在也接受了这种含有敌意的接管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例如“持股人价值观”，而这种观念以往对法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当金融利益横扫欧洲大陆时，实业界的步兵也再次遭到重大伤亡。仅在 1997 年 10 月份，欧洲的公司就砍掉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国际电气工程公司 ABB 宣布削减 10 000 个工作岗位 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 8% 铁路运输合资公司 Adrands 在 ABB 和戴姆勒 - 奔驰公司的支持下，削减了 3 600 个工作岗位 瑞典的滚珠

轴承制造厂 SKF 砍掉了 2000 个工作岗位。德国电器集团西门子公司、Elecfrlux、瑞典的家居用品公司、法国的标致 (Peugeot) 和雷诺 (Renault) 汽车制造公司以及米其林 (Michelin) 轮胎集团公司，在大量裁员方面都名列前茅。被解雇的工人不仅受到伤害，还受到侮辱。他们从充当资本主义参谋长的立约权威和思想库的专家们那里得知，工人受到这样的痛苦只能怪他们自己；置他们于死地的并不是战斗的猛烈火力，而是因为他们“落伍”满足于现状，疲沓懈怠；而这一切都是当前欧洲过时的社会模式造成的。

资本主义的突击部队有充分的理由向欧洲的证券市场挺进，因为他们知道，欧洲正在制造的一件并不很机密的秘密武器已接近完成，那就是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为达到货币联盟的标准，正在加紧对他们的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到了 1997 年底，很少还有人费尽心机地佯称发行欧元只不过是全欧范围内货币紧缩的一种手段，是货币主义者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防御措施。到了 10 月 22 日，甚至美国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也觉得向《金融时报》的读者亮明华盛顿的以下观点已经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因而也就不那么谨慎了：

政策制定者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他们已经不能再让 EMU（经济与货币联盟）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了。通过最近跨国界的合并和购并浪潮，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私有部门已经在对新形势作出反应了。各国政府应该统一思想以利改革付诸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真正的变革。

萨默斯先生笔下的“统一思想”当然只适用美国和欧洲的统治

精英。

1997 年 10 月 22 日 马丁·沃克在《卫报》上写道：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被迫实行紧缩性预算 对其传统的福利国家进行改造，以便在金融上取得实行欧元的资格。这反映了这些国家正在悄悄地接受某种形式的撒切尔主义。……德国和法国大量的失业和证券市场疯狂的火爆同时来到。通货膨胀看来已得到抑制，但大多数欧洲人的实际收入却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而公司利润和证券价格却高高上扬。

战地报道之三 来自太平洋地区战场

德国入侵苏联几天之后，约瑟夫·斯大林终于承认他的“盟友”阿道夫·希特勒确实已经入侵苏联了。1997 年夏秋之交发生了相似的戏剧性情况。“亚洲虎”此时与国际资本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十多年时间里被推崇为东方撒切尔，可是由于黄金枪手拥资亿万的投资家乔治·索洛斯（只是部分原因）吉隆坡的证券市场跌入低谷 林吉特 崩溃 马哈蒂尔却大骂这个犹太人搞阴谋诡计。同样还是那批国际资本家，纷纷寻找出路，马来西亚的邻邦泰国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受害国家。这批国际资本家早就看到今日的太平洋地区已经在做明天的事，因而对这个生机勃勃的地区赞不绝口。泰国的破产太严重了，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遭到打

林吉特（ringgit）马来西亚货币单位。——译者